

文苑笔谈

读书入画 画中读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自古以来，人们便十分重视读书学习。许多名人对读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留下诸多名言。西汉刘向有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用“药”作比，说明读书可以治愈人的愚昧无知。宋代苏东坡提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表明自己立下志愿，要把全天下的字都识完，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一遍。明代董其昌曾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人们通过读书与远行来增长知识。

有趣的是，许多画家喜欢将读书场景作为创作的题材，用手中的画笔，绘就展现读书人读书场景的画作，这也是对读书见解的独特表达方式。在捧读品质画家的画集或画册时，不仅能获得无限美的艺术享受，也能从中感受到读书人不论何时何地，都珍惜读书时光、汲取知识的品格。

这类画作异彩纷呈：有的体现春夏秋冬不同季节读书场景，如元代画家王蒙的《春山读书图》、清代画家恽寿平的《秋山读易图》、清代画家蔡嘉的《秋夜读书图》等。有的反映不同读书地点，如明代画家沈周的《山居读书图》、明代画家蒋嵩的《渔舟读书图》、清代画家禹之鼎的《竹溪读易图》等。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画家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绘画风格亦有差异，但在创作以读书为题材的画作时，画家都注重画面中对“读书”这一场景的描绘，给赏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情趣盎然。

清代著名画家石涛绘有多幅以读书为题材的画作，如《山窗研读图》《松窗读易图》等。《松窗读易图》创作于1701年，大小为187×80cm，纸本设色，现收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画面中，远处山峦巍峨、树木蓊郁，近处几株松树虬枝苍翠、松针刚劲，两座瓦房建在松树旁，其中一座瓦房开着窗，邻近巨石。仔细一看，一高士正坐在窗旁读书，从画作的名称来看，这高士读的正是《周易》。瓦房周边环境幽静，实为读书的妙地，难怪这位高士读起书来如此专注！此图水墨淡色，苍蔚幽森，山清气爽，再将高士读书的情景置于画中，平添画面的文气雅韵。

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绘有一幅《疏雨牧读图》，创作于1881年，大小为136.6×33cm，纸本设色，现收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院。画面上有一大一小两头牛，悠然站立，大牛头侧向前右方，小牛依偎在大牛一侧，脸向后方。牛身旁有一硕大古树，枝繁叶茂，枝叶似乎正被风雨吹向一侧。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两头牛旁有一放牧者身穿淡色衣服，赤着脚，蹲坐在古树下，双手捧书，目不转睛。这位放牧者利用牧牛间隙，不怕风雨影响，见缝插针读书，可见对书之喜爱。浓浓的墨色，精心的构图，鲜活的场景，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疏雨牧读图，独具情趣。

近代著名画家吴昌硕绘有一幅《挑灯读书图》，创作于1908年，纸本墨色，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从画面看，一人披衣而坐，膝前置一竹架油灯，凭借灯光正在读书，那昂扬眸目、聚精会神之状，尽显读书神采。上题沈石友的诗：“日短夜更长，灯残影相吊。独坐犹时艰，突突心自跳。微吟有谁知，颯颯暗中笑。黄叶挂蛛丝，风吹作鬼叫。”吴昌硕与沈石友为一生契友，其时时共鸣，不断发为诗画。沈石友之诗与吴昌硕之画相互映衬，读书之景已在画中尽显，诗又点出人物内心，意味悠长。

近现代著名画家张大千绘画题材广泛，读书也是他笔下的题材。他的《松根读书图》创作于1930年，大小为32.5×21cm，纸本设色。画面上，松枝虬屈，松秀豪劲，松旁几株修竹，纤细摇曳，邻近的小小树枝上，红叶耀耀，在如此优美的环境里，一高士在松树下席地而坐，左手搭在地上，右手托着一本书，眼睛正注视着书本，一副全神贯注的读书模样。纵观画图，人物姿态怡然，衣纹流畅，画面色彩淡雅，颇具古意。

读书让人更加谦逊、通达，以读书入画，更添雅致。不妨趁年华正好，品读书画，在其中修炼更好的自己。



元代王蒙画作《春山读书图》

阅评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万船齐放横渡长江。5月7日，正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投身于“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伟大事业的周恩来，特意致信中宣部，交代了一件重要事项：要保护好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如今，在浙江省湖州市档案馆中，就珍藏着这样一份周恩来的信件，原文是：“希望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

信中提到的“嘉业堂藏书楼”究竟是什么来头？要解答这一疑问，还得从“嘉业堂藏书楼”的收藏说起。这座与私家园林融为一体的藏书楼，鼎盛时期的藏书有五十万卷之多，总量达十余万册。此外，这座庞大的书库坐拥宋元时期珍罕无比的精槧百余部，举世瞩目的《永乐大典》也有四十余册，更兼有百余册秘藏《四库全书》原稿，千余种精心搜采而来的镇志、县志、府志等各种地方志，多达三万余册。

别的不说，仅就《永乐大典》的海内外收藏数量最新统计数据而言，这座隐匿于江南小镇的私家藏书楼，已然可以媲美如今海内外众多的公私收藏机构了。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湾），乃是《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而“嘉业堂藏书楼”当年的旧藏，已是这一数量的五分之一。

“富可敌国”！通过了解《永乐大典》收藏数量而得以稍稍知悉这座藏书楼“底细”的后世读者，恐怕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当年鼎革剧变之际，周恩来还记挂心头、要求力保的藏书楼，到底是什么来头，这一下子就一清二楚了吗？

“富可敌国”，这座藏书楼的确当得起。这里的“富”，并不单指数字，还有另一种理解，即一是物质财富，一是精神财富。物质财富，是瞧得见、摸得着的古籍珍本；精神财富，则是真金白银、费心劳力搜求来的，世代必得精心守护、可予传承的历史遗产。能有这份产业，能有这份家底，当然是富户人家，且一定还是相当富裕的人才才行。这座藏书楼原来的主人，即是当年的湖州南浔“首富”，世称“四象八牛”之一的刘镛之孙刘承幹。

影评

近期热播的纪录片《人民的利益》聚焦检察公益诉讼，以纪实镜头为刀，剖开了中国法治进程中一段生动的截面。这部历时一年跟踪拍摄的纪录片，不仅全景式展现了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妇女权益保障等领域的创新实践，更以“公共利益守护者”的视角，重新定义了新时代法治叙事的价值坐标。

作为一部兼具司法专业性与人文关怀的法治文艺作品，其在叙事策略、价值传递等层面的突破性探索，为新时代法治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参考。

法治叙事的新维度 从“宏大叙事”到“微观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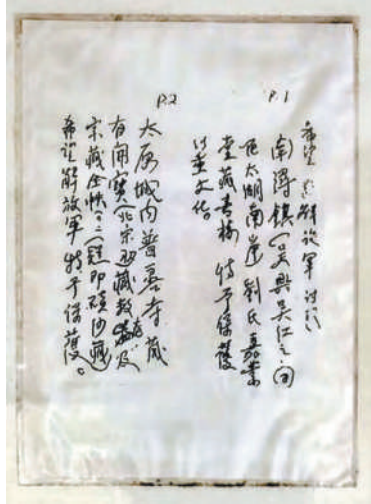
传统法治题材作品往往聚焦于标志性案件的庭审交锋或制度建设的里程碑事件，而《人民的利益》则创造性地将镜头对准检察公益诉讼一线，将抽象的“公共利益”具象化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命运。

内蒙古草原上为土地维权奔走的农村出嫁妇女群体、因网络“开盒”遭遇生活困扰的普通网民、依赖轮椅却无法畅行公共场所的残障人士……这些曾经被忽视的“微小叙事”，在检察官的办案过程中被重新编码为具有公共价值的法治命题。这种叙事转向的背后，是创作者对公益诉讼本质的深刻洞察。正如《人民的利益》总导演在创作手记中所言：“公益诉讼的火种，点燃的是协同治理的篝火。”

纪录片通过“雪豹盗猎案”“长城保护案”等典型案例，揭示了公益诉讼独特的制度逻辑：它既不是单纯的追责工具，也不是政府职能的替代品，而是在法律框架内构建多元共治的桥梁。镜头记录的不仅是案件的办理流程，更是一种新型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轨迹。

“湖”水土 一脉文明

肖伊绯



周恩来的信件

那么，什么是“四象八牛”呢？这是南浔人计量财富的一种特殊方式。清代南浔人以做丝绸生意起家，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时人以“象”和“牛”来形容他们



嘉业堂藏书楼

镜头记录现场 法律温暖生活

吴贻伙 程灿萍

社会治理的协同效应 法治实践中的“中国智慧”

纪录片中反复出现的“检察建议书”，成为解读中国法治的一把钥匙。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公益诉讼模式，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通过柔性监督与刚性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法律监督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

正如青海三江源地区检察院在办理非法捕捞案件时，既通过检察建议推动渔政部门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又联合当地牧民成立生态保护队，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智慧，生动诠释了“中国之治”的独特魅力。

在跨区域治理层面，纪录片展现了检察机关破解“公地悲剧”的创新实践。针对长江流域水污染、长城保护“三跨”难题，检察机关打破行政壁垒，通过一体化办案机制推动多方协同。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办案态度，不仅体现在对个案的深耕细作上，更彰显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正如片中引用的“寸进”理念，中国法治的进步正是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办理，在制度完善与社会共识的双向互动中稳步前行。

文化价值的传播路径 法治精神的具象化表达

在文化传播层面，《人民的利益》打破了法治题材作品的固有范式，开创了“在场美学”的新范式。

摄制组深入办案一线，用镜头捕捉检察官勘察现场的汗水、与当事人沟通时的眼神、庭审辩论时的姿态，将法律程序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语言。

当观众看到检察官推着轮椅体验无障碍通道时，当听到长城保护志愿者讲述二十年的巡护故事时，

的财富数量——拥有家产白银千万两以上者称之为“象”；五百万两到千万两者，则称之为“牛”。

位居“四象”之首的正是刘镛，即刘承幹的祖父。据考，给刘镛写墓志铭的，乃是刘承幹之父刘锦藻的好友张謇。没错，就是那个被世人誉为晚清实业界“南张北周”的张謇。

墓志铭里有这么一句话：“欧洲诸国开商埠于上海，大购湖丝，岁出口八九万包，业丝者赢获过多，公愤薄，用智力与角，衽舟楫，狎霜露，犯晨夜，突寒暑，诘苦嗜嗇，赴时雷动，不数年而业大起。”

这是张謇对刘镛如何从“湖丝”生意中起家致富的简要概括。所谓“湖丝”，就是浙江湖州出产的蚕丝，以其色白柔韧，质地极佳而闻名于世，行销国内外。刘镛这位后来的南浔“首富”，起初财力薄弱，全凭头脑灵活、吃苦耐劳，方才在“湖丝”的生意场上站稳脚跟，最终“不数年而业大起”。

事实上，湖州自唐代起即为蚕丝的重要产区。明代时“湖丝”已全国闻名，比其他产地的蚕丝更受欢迎。随着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开

启，蒸汽机发明之后的欧洲纺织工业迅猛发展，对中国蚕丝的需求急剧增加，且在欧洲商人眼中，“湖丝”就是最好的中国蚕丝，一时间“湖丝”供不应求。湖州南浔距上海只有百余公里，船只货运仅需两天即可抵达，“湖丝”生意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即刻成为中国当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随之而来的，则是湖州南浔富豪圈层的出现。

刘镛去世之后，其子刘锦藻又是进士出身，刘家可谓富贵功名双全。刘承幹继承刘家财产后，倾心于藏书、刻书事业，又为刘家增添了一份浓墨重彩的书香。

刘承幹终其一生创建、营造与守望的嘉业堂藏书楼，不但在新中国创立之际得到过周恩来的“特别关照”，还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一代文豪鲁迅“点赞”兼“酷评”。

原来，“辛亥革命”不久，费尽家资、倾力搜求古籍珍本的刘承幹，又开始倾心于同样需要大把花钱的刻印书籍这一艰巨事业之中，先后刊刻了数百种颇有学术价值的古本丛书。缪荃孙、叶昌炽、孙德谦、杨钟羲等一代硕学宿儒，感其赤子之心，或为之考证，或为之编校，使得嘉业堂刊刻的书籍，有了学术水准上的基本保证。因为有学养一流的学者襄助，加上手艺精良的刻工共同参与，嘉业堂刻本在业内有着“几媲美古”的美誉，即称誉其校勘之善、刻印之精，可与明代文人毛晋创办的用来珍藏和刻印古籍善本的“汲古阁”中的刻书相媲美，这在古籍刊刻界无疑是极为尊崇的评价了。

刘承幹刊刻书籍的一腔热忱与一片痴心，不但令江浙商界乃至国内工商业界人士刮目相看，更令张元济、罗振玉、叶德辉等书界名士大为感动，纷纷贡献自己秘藏多年的善本、珍本乃至孤本，供其刊刻。于是乎，那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秘稿古本，随之化身千万，泽被学林。嘉业堂刻书的读者众多，既有享誉学界久矣的前贤名宿，亦不乏新时代新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新派人物，鲁迅正是其中之一。

1935年末，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说，刘氏嘉业堂刊刻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闲渔闲录》等书，都曾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世人都难以读到。而刘承幹偏偏想方设

法，要把这“禁书”重新刊刻印行，鲁迅表示，“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非但如此，鲁迅在致友人杨霁云的信中还曾说过，“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这里的“傻公子”，正是怀着一颗执着得近乎痴傻，不计成本刊刻善本的刘承幹。鲁迅抛出的这个“傻”字，可以视作“酷评”。

无论“点赞”还是“酷评”，都丝毫不影响这位南浔“首富”的藏书与刻书事业。嘉业堂里，南浔镇上，湖州界内，江南之中，以书为载体的精神财富，也随之日益丰富。曾经的“亿万富豪”，已逐渐隐入尘烟。可那不变的精神财富，却世代流传。

4. 湖州地界，自古文教昌盛，可谓“斯文在兹”。

《岳阳楼记》开篇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里的滕子京，在去任巴陵之前便是湖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庆历元年，滕子京亲自请来胡瑗先生，在湖州设立了安定书院，并且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一时之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天下闻名的“湖学”体系形成。元代之后，“文房四宝”的翘楚之作，文人墨客的无上至宝——“湖笔”，又闻名于世，无不宣示着湖州的文脉久长。

且看张志和行游于此，慨叹“西塞山前白鹭飞”的绝世景致；茶圣陆羽悄然隐居至此，写出传世《茶经》。在这里，或显或隐，或游或居，皆为青山绿水提携，都是梦乡画境伴侣；在这里，显官与隐士毗邻，豪达与清流同席；在这里，耕读世代传家，渔樵亦重礼义。如此知书达礼，自然安居乐业，自然其乐融融。

遥望湖州山水，漫步湖州乡土，不难发现，文明的传承，不只熏陶了古时的文人墨客，也涵养了湖州人务实开放、重情识礼的文化品格。比方说，湖州人自古知礼重孝，湖州的孝丰镇即以孝立镇，“孟宗哭竹”的典故就发源于此。湖州人通情重义，乡里贤达扶危济困之举频见于历史记载。譬如，南朝名士沈麟士曾在此给学子讲经，救助孤儿；清代时，前文提到的因从事“湖丝”贸易发迹的富商刘镛，更是仗义疏财，曾倾囊救助乡里灾民。

在文化底蕴的滋养、精神力量的支撑之下，这湖丝、湖笔、湖学里的文明一脉，已逐渐浸润为湖州最温暖、最鲜明的底色。追忆千年过往，如今的湖州一方水土，依然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湖州人务实开放、书香礼仪的文化底蕴，更见深厚，更见深远。

《人民的利益》第三集《守望长城》海报



抽象的法律原则转化为具象的生活场景，法治精神由此获得了情感共鸣的载体。

纪录片还巧妙运用符号化叙事强化文化认同。黄河、长城、雪豹等意象不仅是案件线索，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守望长城》分集中，检察官对长城本体与周边环境的系统性保护，暗合了“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在《无碍之上》分集中，无障碍设施的完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镜像投射。这种将法治实践嵌入传统文化脉络的叙事策略，使公益诉讼获得了超越法律文本的精神内涵。

法治宣传的创新实践 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的法治伴奏，《人民的利益》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启，蒸汽机发明之后的欧洲纺织工业迅猛发展，对中国蚕丝的需求急剧增加，且在欧洲商人眼中，“湖丝”就是最好的中国蚕丝，一时间“湖丝”供不应求。湖州南浔距上海只有百余公里，船只货运仅需两天即可抵达，“湖丝”生意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即刻成为中国当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随之而来的，则是湖州南浔富豪圈层的出现。

刘镛去世之后，其子刘锦藻又是进士出身，刘家可谓富贵功名双全。刘承幹继承刘家财产后，倾心于藏书、刻书事业，又为刘家增添了一份浓墨重彩的书香。

刘承幹终其一生创建、营造与守望的嘉业堂藏书楼，不但在新中国创立之际得到过周恩来的“特别关照”，还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一代文豪鲁迅“点赞”兼“酷评”。

原来，“辛亥革命”不久，费尽家资、倾力搜求古籍珍本的刘承幹，又开始倾心于同样需要大把花钱的刻印书籍这一艰巨事业之中，先后刊刻了数百种颇有学术价值的古本丛书。缪荃孙、叶昌炽、孙德谦、杨钟羲等一代硕学宿儒，感其赤子之心，或为之考证，或为之编校，使得嘉业堂刊刻的书籍，有了学术水准上的基本保证。因为有学养一流的学者襄助，加上手艺精良的刻工共同参与，嘉业堂刻本在业内有着“几媲美古”的美誉，即称誉其校勘之善、刻印之精，可与明代文人毛晋创办的用来珍藏和刻印古籍善本的“汲古阁”中的刻书相媲美，这在古籍刊刻界无疑是极为尊崇的评价了。

刘承幹刊刻书籍的一腔热忱与一片痴心，不但令江浙商界乃至国内工商业界人士刮目相看，更令张元济、罗振玉、叶德辉等书界名士大为感动，纷纷贡献自己秘藏多年的善本、珍本乃至孤本，供其刊刻。于是乎，那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秘稿古本，随之化身千万，泽被学林。嘉业堂刻书的读者众多，既有享誉学界久矣的前贤名宿，亦不乏新时代新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新派人物，鲁迅正是其中之一。

1935年末，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说，刘氏嘉业堂刊刻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闲渔闲录》等书，都曾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世人都难以读到。而刘承幹偏偏想方设

法，要把这“禁书”重新刊刻印行，鲁迅表示，“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非但如此，鲁迅在致友人杨霁云的信中还曾说过，“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这里的“傻公子”，正是怀着一颗执着得近乎痴傻，不计成本刊刻善本的刘承幹。鲁迅抛出的这个“傻”字，可以视作“酷评”。

无论“点赞”还是“酷评”，都丝毫不影响这位南浔“首富”的藏书与刻书事业。嘉业堂里，南浔镇上，湖州界内，江南之中，以书为载体的精神财富，也随之日益丰富。曾经的“亿万富豪”，已逐渐隐入尘烟。可那不变的精神财富，却世代流传。

4. 湖州地界，自古文教昌盛，可谓“斯文在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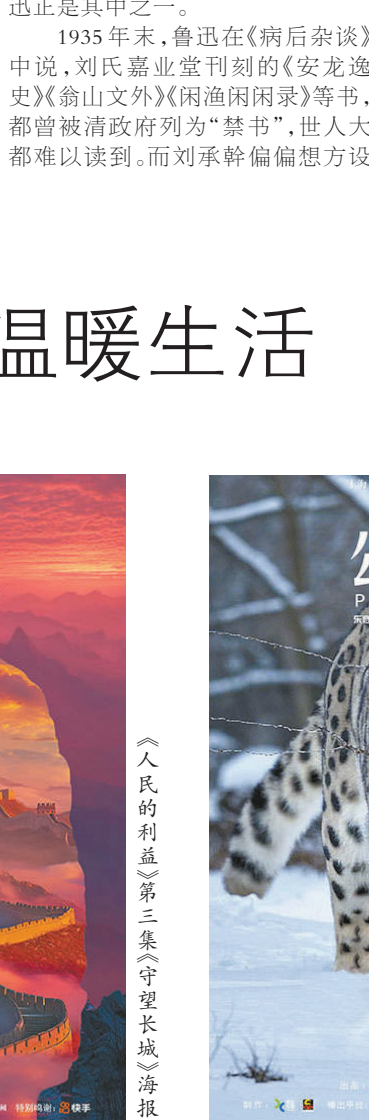
《岳阳楼记》开篇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里的滕子京，在去任巴陵之前便是湖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庆历元年，滕子京亲自请来胡瑗先生，在湖州设立了安定书院，并且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一时之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天下闻名的“湖学”体系形成。元代之后，“文房四宝”的翘楚之作，文人墨客的无上至宝——“湖笔”，又闻名于世，无不宣示着湖州的文脉久长。

且看张志和行游于此，慨叹“西塞山前白鹭飞”的绝世景致；茶圣陆羽悄然隐居至此，写出传世《茶经》。在这里，或显或隐，或游或居，皆为青山绿水提携，都是梦乡画境伴侣；在这里，显官与隐士毗邻，豪达与清流同席；在这里，耕读世代传家，渔樵亦重礼义。如此知书达礼，自然安居乐业，自然其乐融融。

遥望湖州山水，漫步湖州乡土，不难发现，文明的传承，不只熏陶了古时的文人墨客，也涵养了湖州人务实开放、重情识礼的文化品格。比方说，湖州人自古知礼重孝，湖州的孝丰镇即以孝立镇，“孟宗哭竹”的典故就发源于此。湖州人通情重义，乡里贤达扶危济困之举频见于历史记载。譬如，南朝名士沈麟士曾在此给学子讲经，救助孤儿；清代时，前文提到的因从事“湖丝”贸易发迹的富商刘镛，更是仗义疏财，曾倾囊救助乡里灾民。

在文化底蕴的滋养、精神力量的支撑之下，这湖丝、湖笔、湖学里的文明一脉，已逐渐浸润为湖州最温暖、最鲜明的底色。追忆千年过往，如今的湖州一方水土，依然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湖州人务实开放、书香礼仪的文化底蕴，更见深厚，更见深远。

《人民的利益》第四集《公共之地》海报



避矛盾的创作态度，反而增强了作品的公信力，印证了“法治是在解决问题中进步”的朴素真理。

《人民的利益》不仅是一部记录法治进程的纪录片，更是一部参与法治建设的行动指南。它用一年的时间跨度真实记录下一段法治截面史，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真谛：当检察官在雪域高原守护藏羚羊迁徙通道时，当他们在办公室里核查个人信息泄露线索时，他们的身影构成了中国法治最动人的剪影。

真正的法治传播，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也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轻轻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法治信仰；不是冰冷的条文罗列，而是让正义可触摸、可感知、可传播的生命体验。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上，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法治文艺作品，让法律不再是书本上的铅字，而是照亮人民生活的温暖光芒。